

怀故人

冻死迎风站

——怀念我的父亲

支久懿

《烟台晚报》上刊登了我怀念母亲的文章后，熟悉的部队和地方亲友们纷纷奔走相告，连远在北京的老首长和老部下们都来索要报纸。大家都建言：你那“冻死迎风站”的老父亲也应该好好写写啊！

其实我很怀念父亲，这和我幼时发狠不沾他一点儿光一样深刻。

2019年中秋父亲病危，我从北京匆匆赶回烟台干休所的家里。走进家门，我看见父亲平淡地坐在椅子上，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用命令式的口吻对我说道：“等我咽了气儿，你把我烧了后再回北京！”我一脸惊愕，父亲如此坦然地面对生死让我肃然起敬。我现在常想父亲的离去是驾鹤西游了，他走得那么从容，彰显了他军人的气节、硬汉的形象。

投身革命 九死一生

父亲1929年出生在沂蒙山区的一户地主家庭。父亲有一个大的家族，是当地大户人家，有良田千顷。家族的前辈们在接受现代教育之后，为中华民族之存亡，他们接受了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。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家族的前辈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入到了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。不管是在敌人的监狱里、刑场上，还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，他们不为官不图钱，抛头颅洒热血，浴血奋斗，前仆后继。

父亲在家族长辈的影响下，儿童时期就积极参加革命活动。他那时常牵着一头驴，驮着参加过长征的女八路军王兴同志，晚出早归去各村宣传抗日发展党组织。后来县里组织少年抗日儿童团，父亲被推荐为副团长。他组织儿童团员们站岗放哨，给八路军送信，积极地投入抗日的烽火之中，正如父亲晚年诗词里所写的“八路教我唱大刀”。父亲离休后，原部队重新审查他参加革命的时间，认定他为1941年参加革命。父亲拒绝了。他只认定1945年参军是他参加革命的时间，这体现了他光明磊落的性格。

1945年春，父亲瞒着家里参军入伍，那年他还不到十六岁。参军后他参加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。父亲作战英勇，不怕流血牺牲，先后四次负伤。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陪父亲在干休所大澡堂洗澡，干休所的一位老干部指着父亲身上的伤疤说：“一看你身上的伤疤就知道子弹是从前面打进去的，你这是在向前冲锋时受的伤，好样的。”

1948年淮海战役，父亲身负重伤，担架队把他从战场上抬了下来。走到一个村庄停下来休息，担架放在一户农家的门前。这时父亲醒了过来，看见一个小男孩蹲在担架前，听到小男孩的母亲喊孩子的乳名。父亲忽然想起自己



一九五三年的父亲

有一个远嫁他乡的姑姑，孩子也叫这个乳名。父亲就试着喊了一声小男孩的乳名。小男孩马上起身就往家里跑，边跑边喊：“娘，门外一个受伤的八路喊我的小名！”孩子的母亲像触了电似地跑了出来，父亲一看果真是自己的亲姑姑！姑姑喊着父亲的小名，顾不上满身是血，抱着父亲就大哭起来。父亲叫了声“姑”便说“我饿”。父亲的姑姑听到后，立刻站起身来哭着说：“你等着，姑给你做饭去。”当这碗荷包蛋面条做好从家里端出来时，担架队忽然接到紧急命令要马上转移。担架队抬起父亲就走，结果这碗鸡蛋面父亲也没吃上。担架队走了一段路，父亲看见姑姑抱着一床被子疯了似地跑了过来，哭着把被子盖在他的身上……自此一别，父亲一生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位姑姑。

父亲这一次负伤是他第四次负伤，也是最凶险的一次，炮弹壳蹦进了他的骨盆里。因当时医疗条件差不能手术，父亲发高烧常常昏迷，人瘦得皮包骨头。大家以为他死了，要把他抬出去埋了。在抬他时，炮弹壳从他屁股的皮肤上露了出来。野战医院院长看他还有口气，便拿起手术刀朝着露出炮弹壳的伤口动了刀，脓血喷溅了院长一身，父亲当场昏了过去。

这一刀救了父亲一命。后来，野战医院特批了他四只老母鸡。到了晚年，父亲还经常津津有味地和我们回忆，他如何与战友一起享用那几只老母鸡的美味。

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，父亲因寒冷饥饿得了夜盲症，冻掉了他的十个脚趾甲盖，行军时常向前摔跟头。抗美援朝后期，美国人发动细菌战，父亲感染伤寒，高烧40摄氏度不退。在把他运回国内时，医生摘掉了戴在他头上40多天没有摘过的帽子，一头乌发随着帽子一起脱落了。父亲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九死一生，能够活下来，是

他的万幸。

父亲19岁就担任连指导员。他回忆，在那漫天大雪的雪地里，他一声口令就整整齐齐站着一百多名全副武装的战士，那时让父亲感到特别地自豪，可一场仗打下来就剩了十几个人。我曾经多次要父亲讲述他在战场上的英勇故事，但他常常念叨的，是他身边三个通讯员的牺牲……

父亲一生难忘的是解放战争时期，半年里就牺牲了身边三位通讯员，最大的不到十八岁，最小的才十六岁。跟着他时间最短的通讯员只有三天，敌人的一发炮弹打过来，通讯员当场被炸飞。父亲负了重伤，因战事紧张连这位通讯员的名字都没有记住，只知道他是淄博人。年纪最大也是跟父亲时间较长的通讯员还救过他。一次部队夜行军，在公路上与国民党军队遭遇，双方打了起来。由于天黑战场混乱分不清敌我，父亲跑到公路上观察情况，看到一个军官骑着马站在公路上，父亲以为是他的营长，便跑了过去想问明情况。当他从马后转到马前，这才看清是一个国民党军官。那国民党军官一把抓住父亲的后衣领使他无法挣脱，关键时刻这位通讯员冲了上去，一枪托把那国民党军官砸下马救了父亲。在一次城市巷战中，父亲带着连队隐蔽通过一个十字路口，当走到房角要左转弯时，这位通讯员一把拉住父亲，端着枪走在了父亲的前面。刚一拐弯一梭子机枪子弹打中他的上身，他这是替父亲挡了这一梭子子弹。当父亲把他从地上抱起来，他挣扎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父亲让他保管的半包香烟，颤抖着递给父亲就牺牲了，父亲抱着他嚎啕大哭。那位年纪最小的通讯员非常调皮，常在阵地前蹦蹦跳跳，父亲多次命令他注意隐蔽。一次战斗中父亲让他去送个信，在翻越战壕时敌人一发子弹打过来他就牺牲了。

这三个小通讯员的牺牲是父亲一生的心痛，难以忘怀，父亲到了晚年还常常回忆起他们。这些解放军战士为了人民的解放、民族的复兴牺牲了年轻的生命，他们与祖国山河同在，永垂不朽。

战争年代是父亲激情燃烧的岁月，当年革命军队里的火热生活，使他热烈而耿直的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彰显，这是父亲人生中最精彩的年华。

教育子女 严厉近苛

父亲对我的教育也是男人的方式，他认为孩子不能娇生惯养。我小的时候父亲在外地忙工作，一年难得见到他一面。有一次，我腿肚子上长了个脓疔子，父亲带我去部队卫生所，医生说要动刀子，父亲只对我下了命令“勇敢点”。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，医生在我

的腿肚上剃了两刀。我十岁时父亲让我一个人坐火车去莱阳部队医院做扁桃腺切除手术，手术住院也没人陪我。一周后父亲接我出院，在我脑袋上拍了一下，说了声“挺勇敢的”。为了奖励我要带我去打靶，先找了个半自动步枪训练了我两天，我第一次打靶两个8环一个7环得到一片赞扬，自此以后我的枪就打得挺准。当兵时新兵连训练结束打靶，我用半自动步枪卧姿射击，3发子弹，两个10环一个9环，惊动了新兵营的干部。1979年，我带一个尖子班参加福州军区高炮部队军事大比武，由我兼任主要枪手，带领全班命中飞机靶，首创福州军区高炮靶场高射机枪单枪命中飞机靶的纪录，全班荣获集体二等功。

我刚上初中时去父亲那儿度暑假，看到他的办公室书柜里存放着许多国内外军事方面的书籍。我先是对外国军事装备感兴趣，后来开始阅读书柜里二次大战史的一些传记，从美国人写的《第三帝国兴亡》到苏联元帅朱可夫的传记《回忆与思考》《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》等书籍，我那时看这些书达到了痴迷的程度。父亲支持我看书，但对我有一个要求“只能在家看，不能拿到外面去”。这些书给了我启蒙的知识储备，甚至影响了我一生。

父亲常教育我“你的一生要靠你自己努力，不能靠我”。我高中毕业，在让我姐姐上山下乡之后，父亲又动员我下乡，说是要我到农村去锻炼。1978年我入伍参军，经过带兵干部查档案和面试，在烟台这批新兵中特招了两名军里的通信机要员，其中一个就是我。父亲知道后不同意我在军机关里当兵，非要我下野战连队。我说人家是因为我优秀才安排我的，不是因为你是你。父亲却说，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因为我？跟你说，你和你姐姐都不能因为我搞一点儿特殊！我当时就愤愤地想：我一辈子要凭我自己的本事，不沾你老头儿一点光！

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，我们师是总参预备队，要用在关键战场上，部队进入了紧张的战前动员和训练。这时我给父亲写了封信，信中告诉父亲，假如我在战场上牺牲了，请他安慰好母亲。父亲在回信中严肃地写道：“你的父辈是提着脑袋打出来的，你也要不怕流血牺牲勇敢地走上战场，家里的事你不要管……”其实说父亲不担心是假的，那些天他天天跑作战室看我们部队调动情况的战报。

追思父亲，他的故事像电影般历历在目，潸然泪下的我更重新认识了自己的父亲。父亲一生坦坦荡荡、刚正不阿、一身正气。

父亲有句名言：冻死迎风站，饿死不弯腰。他一生的性格和品质践行了这句名言。

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解放上海后父亲(中)与战友合影